

五十年代的 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

• 趙稀方

一

1949年，大陸紅色政權建立，蔣介石政府逃到台灣。儘管中國聲稱擁有主權，但香港仍然被保留在殖民體制內。為了香港的緣故，英國早早就承認了新中國政權，這一度讓美國很惱火。但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對於韓戰的支持態度又讓美英兩國關係緩和下來。1952年1月9日，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在與來訪的邱吉爾首相會談後發表公報稱：為共同防禦的需要，美國可以在某種情況中使用香港的基地。美國日益意識到台灣、香港在其遠東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其部署中，香港是其全面遏制和演變中國的前哨陣地。在這種情形下，美國開始成倍增加它在香港的機構人員：1938年，美國在香港只有一名總領事、兩名領事和兩名副領事，及至1953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15人，其中包括四名領事和二十名副領事，在港美國人也達到1,262人。香港總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在1968年電台訪談的時候

說：「我比不上他們(領事)——世界上找不到這麼龐大的隊伍，他們以『中國大陸合法政府為敵』。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時更是笨拙無比，我們費老大勁才止住他們的愚蠢行為。」^①因為外交關係的不同，英國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完全一樣，美國在香港的威脅到殖民地自身利益的活動會讓英國感到不滿。不過，總體來說，美英之間是一種同盟的關係。

美國在香港活動最重要的機關，是美國新聞處 (USIS——Hong Kong)，它擔負着宣傳心理戰等重要使命。1953年的美國「國家計劃」，表明香港新聞處較美國駐其他地區新聞處的「不同尋常」之處。這一「國家計劃」有三個主要目的^②：

破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力量和支持的資源」，給「反共產黨份子以希望和鼓勵」；誘使「東南亞華人支持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政策和措施，在他們之中製造反共情緒和行動」；得到「香港對於美國和自由世界政策和措施的日益增加的理解和支持。」

1949年，大陸紅色政權建立，美國意識到香港在其遠東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其部署中，香港是其全面遏制和演變中國的前哨陣地。美國在香港活動最重要的機關，是美國新聞處，較之美國駐其他地區新聞處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擔負着宣傳心理戰等重要使命，被列入美國「國家計劃」。

韓戰使香港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功能發生了變化：香港由「難民城」成為「民主櫥窗」與「大陸觀察站」。美元資助的較具影響的香港出版機構有亞洲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等。它們聯合起來出版反共報刊和文藝書籍。當時香港報刊的一般稿酬均為千字五元，亞洲出版社的稿酬卻高達千字二十元。這種高稿費，對南下香港、艱於謀生的文人，當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1957年7月1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頒布「美國對香港政策」的NSC5717號檔。這是美國最高決策當局第一次制訂的專門論及美國對香港政策的綱領性檔，該秘密檔在1990年解密後，仍留有多處數百行文字尚未公開。該檔在論及了美國的香港政策的軍事、經濟、政治諸問題後，專門規定了文化任務，其內容為「利用香港作為對大陸進行宣傳和滲透的據點的戰略設想，美國政府將利用其駐香港總領事館和美國新聞媒介駐港機構展開對中國的宣傳攻勢，以取得軍事封鎖和經濟遏制所難以起到的效果」等。另外，1960年6月11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經過修改的、經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簽字批准的NSC6007/1號檔中，提到了「加強了對香港中文媒體的滲透與控制，並鼓勵台灣國民黨當局的中文媒體也大舉擠入香港地區」^⑧。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檔中直接為該項計劃的實施確定了未來的財政預算。1960年和1961年，美國實施該專案的財政預算分別為682萬美元和589萬美元。

由於抗日和國共內戰，大陸文人兩次南來香港，1949年前的香港文壇主要為左翼文學所佔據。1949年後，左翼文人北上，不容於新中國的人從大陸南下。香港文壇由此變得蕭索，但並沒有立刻變色。初期雖有少數人寫反共報告文學等，但布不成陣。在香港當時的三大報刊《華僑》、《星島》和《工商》的「副刊」中，《華僑》和《星島》都嚴守中立。文藝陣地也十分有限，香港報業「四大金剛」：《香港時報》、《工商日報》、《自然日報》、《呼聲報》都不能發表稍長的東西。據反共作家，後來香港「綠背文學」的代表人物趙滋蕃自述：香港文

壇的變化開始於1950年春美國大使吉賽甫訪問香港，吉賽甫大使的談話「在當時的人聽來，不啻注射了一針強有力的興奮劑」，而決定性的因素在韓戰。韓戰使香港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功能發生了變化：「韓戰既起，香港由『難民城』成為『民主櫥窗』與『大陸觀察站』。」^④從此，香港的反共文藝在美國的資金扶植下繁榮起來。美元資助的較具影響的香港出版機構有亞洲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等。它們聯合起來出版反共報刊和文藝書籍，幾乎支配了當時的香港文壇。出版反共著作較龐大的是亞洲出版社，涉及小說、報告文學、社科、人物傳記、翻譯以至連環畫等等。比如，「報告文學」：許瑾《毛澤東殺了我的丈夫》、蔡慕華《潮汕淪陷三年》、裴有明《我來自東北奴工營》；「學術著作」：趙蘭坪《馬克思經濟學說批評》、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專題研究」：馬伯樂《蘇聯能戰勝嗎》、何雨文《中共財政解剖》、丁焱《中共文藝總批判》；「人物評傳」：鄭學稼《魯迅正傳》、史劍《郭沫若批判》；「翻譯名著」：雷神父著，李潘郁譯《中國赤潮記》等；「文學作品」：趙滋蕃《半下流社會》、林適存《駝鳥》、張一帆《春到調景嶺》、傑克《山樓夢雨》等等^⑤。

亞洲出版社等之所以能夠有這麼多稿源，與其高額資助有關。當時香港報刊的一般稿酬均為千字五元，亞洲出版社的稿酬卻高達千字二十元。大陸南下的文人，多數在香港艱於謀生，這種稿費對他們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他們多數因為對於大陸新政權不理解或有怨氣才出來的，因此很容易走上反共寫作的道路。劉以鬯

曾談及路易士、張愛玲、徐訏幾位作家被迫賣文為生的情形^⑥：

那時期，從內地來到香港的知識份子，因人地兩疏，謀生不易，只好煮字療飢。小說家路易士曾坦白承認：「我彷彿沒有想過要寫小說，更沒有想過要以此為生，不料飢來驅我，終於陸陸續續寫了幾十萬字……我每一次在夜的街上遇見十五六歲的『神女』，必定會興起由衷的同情，我和她們，原是一樣的可憐蟲！……我們一樣是為了麵包。」

事實上，像路易士那樣『為了麵包』而寫小說的，很多。1952年，以繼續學業為名從上海來到香港的張愛玲，不但將翻譯的《老人與海》、《歐文小說選》、《鹿苑長春》、《愛默森文選》等交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而且為美新處寫了兩部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

另一位小說家徐訏，於1950年從上海來到香港後，因生活不安定，曾對他的朋友張同表示：如果真要賣文為生，他可以大量生產，稿分三等，按等級收費。

其實，路易士、張愛玲、徐訏等都屬於文壇名作家，稿子容易出手，甚至獲大價錢。對於不知名的作家來說，情形更為困難。更有甚者，很多大陸南來者，連作家都算不上。他們在香港找不到職業，因為尚有文化，所以常常以寫稿掙錢為生。在張一帆的小說《春到調景嶺》中，王仲鳴曾和主人公李志良談起在香港寫作的情形：「目前香港的稿子出路並不寬……除非是內容文筆兼臻上乘，或是在國內有鼎鼎大名的作家，可能佔得一席之地。至於如你我這種人，儘管文筆

不在水準以下，也很難得被編者採用。」^⑦林適存的小說《駝鳥》的第十九節題為「八千字」，主人公丁曉文與朋友黃汕淪落到棚戶裏，只能靠給黃色小報寫稿為生，但仍然想到舞廳跳舞。他們直接以文章的字數計算可以跳舞的時候：「八千字夠兩人快樂一個晚上。」「這麼罷！我們只跳兩千字，兩千字要寫一個多鐘頭。」「好！兩個人跳三千字，再加一千。」這段看起來詼諧的文字，形容地表明了文字寫作對於南來難民生計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種情形下，高額美元稿費的吸引力就可以想像了。對於艱於生計的難民來說，為了掙錢，甚麼不能寫呢？況且，他們本來就是因為不滿大陸而出來的。這就是亞洲出版社等稿源爆滿，反共文學不斷地被製造出來的原因。

就題材而言，上述反共文學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寫大陸的，一是寫香港的。寫大陸的作品，主要是揭露控訴中共紅色政權黑幕；寫香港的作品，主要寫南下香港難民。

寫大陸的作品中，最為有名的是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其描寫的對象是國內的土改、「三反五反」和朝鮮戰爭等，均是張愛玲所不熟悉的題材，政治色彩十分濃重。張愛玲原來一貫不屑於與政治為伍的，她曾在〈有幾句話同讀者說〉（1947）一文中聲明：「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不幸的是，因為在港的處境，張愛玲這時既寫了政治，還拿了不菲的美金。據說，張愛玲當時為美國新聞處翻譯陳紀澄的《荻村傳》，曾拿到一萬多美元的稿酬，創下讓人眼紅的歷史紀錄^⑧。如此寫作方式，悖離了張愛玲自身的長處。正如柯靈所評論：

反共文學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寫大陸的作品，主要是揭露控訴中共政權黑幕，其中最有名的是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儘管政治是張愛玲所不熟悉的題材。寫香港的作品，主要寫南下香港難民，著名的有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林適存的《駝鳥》、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等。這些作家並不熟悉香港，甚至對香港十分排斥。

「《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⑨據陳若曦回憶：當時麥卡錫曾告訴她，張愛玲的這兩部小說是在他們的授意下向壁虛構的^⑩。事實上，張愛玲後來也承認了這一點。據水晶晚年對張愛玲的採訪，張愛玲曾主動告訴水晶^⑪：

《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甚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

被譽為「文學天才」的張愛玲尚且如此，其他揭露大陸內幕的小說的成績可想而知。就香港文學的角度說，另一類寫香港難民的小說讓人更有興趣，它們有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林適存的《鴛鴦》、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等。事實上，寫作香港難民題材的作家們同樣並不熟悉香港。他們甚至對於香港十分排斥，如《半下流社會》將香港稱為「外國」。不過，退一步說，難民生活倒正可稱為50年代初香港的「現實」。

二

香港歷來是中國大陸的避難之地。1949年大陸江山易幟，大量的人口流入香港，令香港的人口激增。與從前不同的是，這次來港的多是不容於大陸新政權的人，而且流落香港的日子相當艱苦，這也是難民文學成為反共文學的重要原因。這批南來香港的人，多數有相似的境遇。他們剛來時，因為攜帶了金額不等的錢，尚能

周轉，以至過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時間一長，坐吃山空，就窮困潦倒下來，很多人就從酒店淪落到了公寓，再到難民營。當時香港的難民營所在地調景嶺，是這些小說中最常見的場景。小說《春到調景嶺》對於當時香港南來人物的住房遷移有一個描繪：「住公寓的人，還是大批向木屋區移植，住酒店的人又向公寓裏轉移。這象徵着自己的天地越移越小」^⑫。小說的開始，住在公寓裏的李志良等人都預先去難民營參觀了一次，讓我們得以一窺那裏的情狀：「見公路下邊的山坡；盡是搭蓋的油紙小棚，高者五六尺，低者三四尺，鱗次櫛比，直到海邊……這兒的人，大半是衣衫襤褸，面帶菜色。」^⑬香港都市的燈紅酒綠，難民生活的流落失所，大陸紅色政權土改中的迫害，他們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如此等等，這些元素的不同組合，構成了反共難民小說的不同模式。

《半下流社會》的開始，書中人物就已經淪落到住在一個破落的天台上的蘆葦棚裏。他們是做過兩任縣太爺的張輝遠，做過保長的吳孝慈，來自清華哲學系的酸秀才，四川土財主鄭風，做過國軍營長的老鐵等，現在都成了乞丐。這是一個尋常的下流社會。他們現在窮困潦倒，卻有着輝煌的過去。他們仇恨共產黨，懷抱着反攻大陸的希望。從《半下流社會》的主角理想人物王亮的演講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自我合理化的邏輯：「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是鵠立在地獄的邊緣，站在反極權的前哨陣地上在談話。試問：我們甘心情願，流浪……吃苦，到底是為了個人的衣食住行？還是為了國家民族？」^⑭這些人從大陸逃了出來，多數等待着去台灣，但台

南來香港的人多數有相似的境遇。他們剛來時攜帶了金額不等的錢，但時間一長，坐吃山空，很多人從酒店淪落到公寓，再搬到難民營。當時香港的難民營所在地調景嶺，是這些小說中最常見的場景。香港都市的燈紅酒綠，難民生活的流離失所，大陸紅色政權土改中的迫害，他們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等元素的不同組合，構成了反共難民小說的不同模式。

灣方面審查嚴格，一時不能如願，而在香港一時又找不到工作，只好無可奈何地流落街頭。但他們卻以這種「追求自由」的邏輯，把自己的窘境染上了悲壯的色彩。支撐這種邏輯的動力，是對於大陸共產政權的慘無人道的揭露。在這部小說中，蕭鐵軍講了一個雙溝鎮的大地方張善人在土改中被整死的聳人聽聞的故事。張善人被控告與兒媳通姦，於是在公審大會槍斃他的前夕，土改幹部將兩翁媳脫得一絲不掛，讓他們倆當場「表演」，「公審場上，歡笑的是共幹，而輕微歎息的是群眾。」^⑩雖然講述人蕭鐵軍不敢保證這個道聽途說的故事的真實性，聽故事者也紛紛懷疑其真實性，但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倒是明確的，即尋找「苦難」的根源：「使我們成為難民，饑民與無國遊民的主要根源，不在此地，卻在大陸。是誰？使我們背井離鄉，拋妻棄子，來挨這種非人的生活？……冤有頭，債有主，仇恨埋在心底，大家心裏明白。」^⑪在這種邏輯支援下，《半下流社會》演義出一個非常理性化的使徒故事。這個半下流社會的團體，雖則貧窮，卻分工有序，團結互助，而且精神高尚。白天，他們有的去撿拉圾，有的去酒店撿食品，王亮、李曼等人則在家裏寫作，賺取稿費。到了晚上，他們舉行研究晚會，由成員主講如「詩的意境」、「今後戲劇運動的方面」、「短篇小說的分析」等題目。一直到小說最後，「舊世紀沒有走到盡頭，新時代也還沒有來」，他們仍然在苦苦堅持「活下去，以堅強的毅力，支持起我們的社會。」^⑫另外，《半下流社會》還加上了一個李曼墮落的因果報應故事，以支持「半下流社會」主體的正義性。王亮等人的寫作組以

李曼之名發表文章，使李曼在社會上名氣日大，受到了上流社會的追捧。李曼沒能經得住誘惑，傍上一個大亨，終於不得好報，被人拋棄，自殺身亡。

《半下流社會》「忠貞之士」的故事過於將個人際遇納入政治層面，從而將人物行為道德化，顯得宣傳的色彩過重。《駝鳥》則不太一樣，它重點寫主人公丁曉文放浪香港都市，最後「浪子回頭」的故事。因為主要是「浪子」的故事，而「回頭」只是一個結局，這樣的故事好看一些。小說從上海寫起，丁曉文因為貪戀上海歌廳的小姐，誤了飛機，後來偷渡來港。在香港，他找到了和上海一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加之身上有一筆錢，他依舊過起了舊日的燈紅酒綠的日子。即使在錢財消耗殆盡以後，丁曉文居陋室，為小報寫文章，仍在捧歌女。小說對於主人公混迹香港的日子描寫，筆致熟嫻，不像《半下流社會》那麼機械。但是，小說的最後依然還要歸結到反共的主題。在以鑽石山的何教授為代表的「忠貞之士」的「引導」下，丁曉文終於從墮落的生活擺脫出來。《駝鳥》的主人公丁曉文的老家，照例受到了土改的衝擊。土改幹部為了打聽丁曉文的下落，嚴刑拷打他的弟弟，把他裸體放進布滿蛆蟲的木桶裏受盡折磨。南來香港的人，很多人既出自於反共的國民黨系統，又來自有錢有勢的地主家庭。這種家庭在大陸土改中正是革命的對象，這讓他們都有了一筆「血淚賬」。這種受迫害的血淚故事放在小說最後，儼然成了丁曉文思想轉變中的「邏輯」根據。《駝鳥》中丁曉文的故事，有點像《半下流社會》中李曼故事的放大，但丁曉文的結局不是咎由自取，而是棄暗投明了^⑬。

《半下流社會》、《駝鳥》、《春到調景嶺》等小說主人公，或用「追求自由」的邏輯把自己的窘境染上了悲壯的色彩，或在「忠貞之士」的「引導」下，從墮落的生活擺脫出來，或大膽去大陸打游擊，構成了這些作品「一致反共」的集體想像。

傑克的小說大可以說明反共美元文化對香港本土作家的影響。他在30、40年代從新文學退到「都市傳奇」的寫作，至50年代開始寫作反共小說。傑克並沒有難民的經驗，也談不上對於共產黨政權有感受，但為了得到美元，只能勉為其難地在小說中加入反共內容。在《隔溪香霧》中，傑克勉強地加上了「反共」的結尾，就顯得突兀。

《春到調景嶺》的主人公李志良剛到香港時「住在酒店裏，成天地看戲，跳舞，吃館子」，落難到調景嶺難民營以後，就變得心事沮喪，期待着去台灣。後來，他終於受到「組織」徵召，拿上支票去內地「打游擊」去了。從主人公的經歷看，這看起來像「浪子回頭」和「忠貞之士」模式的結合。從敘述模式上看，這部小說的突出之處是結局。《半下流社會》、《駝鳥》等小說，雖然也提到反攻大陸，但自身既不能回大陸，也去不了台灣，因此雖然苦苦堅持，但前景暗淡，沒有甚麼出路。《春到調景嶺》卻毫無顧忌地大膽想像去大陸打游擊，而且是由一個代表「組織」的舞女陪伴，偽裝成夫婦同去。如此「革命」與「浪漫」的結構，表明作者的反共態度似乎不夠「嚴肅」。吉家父子被大陸紅色政權勒索財物的故事出現在小說的最後，交待得十分匆忙，似乎只是為了應付差事，乾脆連故事描寫也免去了。《春到調景嶺》還透露了另外幾條線索，它們無意中破壞了上述反共文學「一致反共」的集體想像。一是國民黨高官何啟圭。這個「手裏掌握的有十好幾張少將、中將、特任官的任命狀，還有司令、主席之類的頭銜一大堆」^②的有名望的人物，來香港卻不是為了反共。在蔣介石大勢已去的時候，他在大陸適時地搞了一次「通電起義」，然後就在香港等待毛澤東的「任命」了。然而，他只等來了紅色政權讓他回去勞動改造的答覆，一氣之下他轉而登報申明與共產黨撇清關係，準備重新效忠台灣，又同樣遭受了台灣方面的冷遇。另一條線索是國民黨少將鄭浩川。鄭浩川為了騙取經費，向台灣方面謊報成立「川陝鄂邊區游擊隊」，自命司令。獲准承認

後，他以此名義到處騙錢，「他頂着『反共』的時代招牌，用招搖撞騙的手法，生存在『自由民主陣營』裏。」^②《春到調景嶺》的這些「支線」，向讀者泄露了更多的歷史，它們後來成為了阮朗的左翼難民文學的書寫重點。

傑克(黃天石)的情形比較特殊，作為一個香港本土作家，他的小說大致可以說明反共美元文化對於香港本土作家的影響。香港新文學起源於20年代後期，但在30、40年代大陸左翼和50年代大陸右翼作家的主導下，香港新文學作家似乎難有獨立發展的機會。得到過左翼方面扶植的作家，寫過《蝦球傳》的黃谷柳1949年後北上了，留在香港的侶倫既無從沿《窮巷》寫下去，也不願意寫作反共小說，於是回到了從前的「洋場小說」的老路，出版了《戀曲二重奏》、《舊恨》等作品。而未能靠近左翼的作家傑克，在30、40年代從新文學退到「都市傳奇」的寫作，而至50年代則開始在亞洲、友聯等出版社出書，寫作反共小說。傑克本人並沒有難民的經驗，也談不上對於共產黨政權有多少感受，為了得到美元，只能勉為其難地在小說中加入反共內容。傑克出版於友聯的小說《隔溪香霧》主要寫趙昂與施美美的感情際遇，趙昂的寬厚無能和施美美的薄情殘酷頗讓讀者感歎，有點毛姆(William S. Maugham)《人性的枷鎖》(Of Human Bondage)的味道。但小說寫了一大半，還未與反共搭上瓜葛。此後，作者筆鋒開始急轉直下，出現了一個受左派影響的演員翩翩與趙昂的對立。趙昂忽然變得十分激進，當翩翩希望趙昂在劇本裏加進「階級意識」時，他語出驚人地說：「要我出賣人格，出賣民族，為了你，出賣弟兄的血，那就萬萬無可商量的了！」^②小說的

文字亦變得很政治化，並出現直接的反共議論。《隔溪香霧》給人的感覺是，傑克在「都市傳奇」的敘述套路上勉強地加上了「反共」的結尾，顯得突兀。

傑克的另一部出版於亞洲出版社的《山樓夢雨》^②，情形也差不多。這部小說寫香港的銀行家梁倚虹與雙美一小姐的婚外戀故事，原也與反共沾不上邊，但小說的最後一章還是勉強地押到了反共的主題上。梁倚虹的原配夫人提出要一百萬元才肯離婚，梁倚虹為了掙錢，到內地省城建立銀行分行。結果銀行被共產黨充公，他被逼跳樓。文卒顯志，但編造顯得過於離奇。傑克在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則用不着這麼費力地「扣題」。《大亨小傳》(基榮出版社)的主人公夏利歐在國內讀過大學，做過生意，搞過政治，偷渡到香港時窮得連衣服都押進了當舖。他在香港一路坑蒙拐騙，不但有了錢，還有了很多女人。在他惡貫滿盈時，最終得到了惡報。夏利歐看起來像是香港的大陸難民，卻遠非「忠貞之士」。沒有了反共的限制，傑克書寫因果報應的都市顯得游刃有餘，這不能不讓人感歎美元的力量之大。

三

由於綠背文學在50年代的香港佔據主流，因而上述反共文學的歷史敘述十分流行，波及海外，成為人們想像大陸政權真相及香港難民處境的根據，這倒的確符合美元文化操縱反共宣傳的本意。如果想從這種歷史敘述中走出來，簡單的方面是看一看對於香港難民的不同敘述。50年代香港雖然為「綠背文化」所籠罩，但並非完全

沒有其他類型文學作品的存在。不同的歷史想像和書寫模式，呈現出文學的敘事性質，更呈現出背後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權力。

1949年後左翼文人北上，但大陸在香港仍有文化障地，如「大公」、「文匯」、「三聯」、「商務」等。值得一提的左翼作家，是1949年到港的阮朗。阮朗在「共產黨在香港的機關報」《大公報》增出的《新晚報》工作，他自稱：「我們職工不把它當成『飯碗』，而視之為新中國工作的事業。」^③阮朗在《新晚報》連載難民小說《某公館散記》，與反共小說相抗衡。《某公館散記》一書原以本宅管事的筆名連載於《新晚報》，後來改為洛風《人渣》在大陸出版。《某公館散記》集中描寫了《春到調景嶺》提到的國民黨人招搖撞騙的行徑。「主席」撤離大陸時，把國內「銀行、大公司、錢莊、工廠」的資金都帶到香港，在香港繼續過腐化的日子。在香港坐吃山空是不行的，「主席」找到了美國人做靠山。美國人撥下鉅款，資助「主席」辦報進行反共宣傳及進行對於大陸的特務活動。美國人辦報的原則是，「現在要爭取失去的自由，打倒共產黨！最主要的一點是：自由是美國獨家出品，Made in USA！只此一家，別無分出，其他的自由都是假貨！」只要有錢，反共是容易的事，負責辦報的是「主席」的兒子霸王，他隨口定下了「保障女權，替女人們吹吹」、「替天行道，打倒共產黨！」等宗旨。僅此似乎還賺不了多少錢，「主席」夥同韓次長等人將美國人的鉅資挪用於走私，結果資金最後被他人席捲而走，惹得美國人大怒。《某公館散記》對於南來香港難民所作所為的描繪顯然與上述反共文學完全不同，在這裏這些國民黨人毫無

50年代香港雖然為「綠背文化」所籠罩，但仍有其他類型文學作品的存在。1949年後左翼文人北上，但大陸在香港仍有「大公」、「文匯」、「三聯」、「商務」等文化障地。如阮朗的《某公館散記》就與反共小說相抗衡。該小說為在香港的美國勢力提供了一個新的名詞：「第三勢力」。「第三勢力」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創立，是可能替代國民黨的新勢力。

忠貞，既不追求「自由」，也不虔誠反共，不過謀一己私利、過着墮落的生活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某公館散記》在涉及到美國勢力與香港關係的時候，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名詞：「第三勢力」。在《某公館散記》中，我們看到了以惠爾遜為代表的美國人在香港尋找代理人創辦報刊，並向紅色大陸派遣特務滲透的情節。小說中還有原國民黨人對於第三勢力不得要旨的描寫，西老說：「既反蔣，又反共，此實難矣！反蔣者，反台灣國民黨是也，反共者，反大陸人民政府是也，兩者不能兼反，我……將反哪一面也！」還是「主席」的頭腦比較快，「反蔣反共是可以做的，放翁的朋友沒有點明，沒有交代清楚，這種文章很難寫的，我知道一點，反蔣反共就是不反美國人，也就是擁護美國人，懂不懂？」《春到調景嶺》中也有文字涉及到第三勢力。小陶穿了一套西裝回調景嶺，「差不多人人都相信小陶是在香港搞『第三勢力』，證據是在他身上穿的一套新西裝。」◎立刻有人動了念頭，趕來向小陶打聽「第三勢力」的辦公室在甚麼地方。「第三勢力」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親自創立，是可能替代國民黨的新勢力。美國在香港的重心是反對大陸共產黨新政權，它一方面主要利用台灣作為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又親自扶植反共親美新勢力，從事政治文化方面的活動，這是美元文化的一個新的維度。

「左」、右之外，香港仍有中立作家，這裏我們想提到的是曹聚仁。大陸解放伊始，艾思奇在北大演講的時候告誡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塊磚砌到牆裏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牆邊，不砌進去，那就被一腳踢開了！」曹聚仁恐懼自己被一腳踢開，決定南

下香港。但曹聚仁並不仇恨共產黨，他在香港的報刊上以第三者的眼光介紹新中國的情況，為海外讀者提供了一種與「綠背文化」的宣傳不盡相同的視角。當然，曹聚仁並非左派作家，他對於新中國也有批評。曹聚仁這樣做的結果，是導致了左右兩派的發難。曹聚仁不但寫散文，也創作了一部描寫香港難民的小說《酒店》。曹聚仁的《酒店》對於50年代難民的書寫，既不同反共綠背文學，也不同於《某公館散記》。它既不涉及國共兩黨，更不涉及到美國人，既不從「爭取自由」的角度美化難民，也不從招搖撞騙的角度醜化他們，而只是從人文主義的角度揭示來港難民的悲劇。

《酒店》的男主人公陳天聲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後在大學任教，後來官至教育局長。來到香港後，陳天聲並沒有為了「自由」而成為「忠貞之士」，相反，他在香港的舞廳和歌女那裏找到了較以前更為五光十色的自由。「這一年多的香港生活，卻把他的下意識中的根苗烘出頭來，舞場中的聲、色、女人，渲染而成的氣氛，使他陶醉了；他才懂得人間自有仙境，溫柔鄉中另有洞天。」◎後來，陳天聲既無法與黃明中分離，又不能離開已經為他生了孩子的林弟，心理上陷入了矛盾和分裂；而這時候他的原配太太偏偏又帶着孩子們趕到了香港。在愧疚和困擾中，他自殺身亡。小說的女主人公黃明中的父親原是南京中央銀行會計長，因為南來飛機失事，她與母親就成了香港難民。為了解救家難，她淪為舞女。歡場生涯，讓她喪失了原來的質樸，為了爭奪一個情人志傑，她設計毀了另一舞女璐珊的臉。她感到悔恨，但仍不放棄爭奪志傑，終於在情欲和理智的衝突中，進了瘋人院。

「左」、右之外，香港仍有中立作家。曹聚仁以第三者的眼光介紹新中國的情況，為海外讀者提供了一種與「綠背文化」的宣傳不盡相同的視角。曹聚仁描寫香港難民的小說《酒店》，既不涉及國共兩黨，更不涉及到美國，既不從「爭取自由」的角度美化難民，也不從招搖撞騙的角度醜化他們，而只是以人文眼光來揭示香港難民的悲劇。

「左」、右派的小說，似乎都希望通過人物命運，體現政治上的因果關係。《駝鳥》中的丁曉文，與陳天聲一樣在香港的燈紅酒綠中樂不思蜀，但他最後「浪子回頭」，體現了反共的主題。而在《某公館散記》這種左派小說中，招搖撞騙的反共人士最終只能罪有應得，「主席」流落街頭成為測字先生，三姨太和三小姐淪落到髮廊和窯子裏去了。《某公館散記》後來在大陸出版的時候，更有史復之序云：「那些頑固不化，與人民為敵到底的千惡不赦之徒，窯子在等待着他們，他們必然淪落！他們的淪落相必然是可憐相。人們如果動了惻隱之心，那就大大的錯了。」◎曹聚仁並未將人物與政治直接扣連起來，小說着重探討的是：這兵荒馬亂的動盪時代、這商業社會的都市香港，如何將人勾離了正常的軌道，如何使人失去了心智，走向了毀滅。

《酒店》中既有不滿大陸土改的文字，陳天聲的家屬陳太即是在大陸土改中被分掉家產後來香港的，也有不滿香港民主櫥窗的文字。不過，這些在小說中着墨很少，時代背景在《酒店》中是虛寫的。作者沒有褒貶某一種政治，事實上，他反對政治鬥爭本身，「他滿懷憤激之情，對着這窠被社會所抖落的瘦貓，格外覺得人類的冷酷，政治鬥爭的殘忍！『他媽的！再鬥爭下去，我們老百姓都活不成啦！』」◎小說慨歎的是時代的動盪，是「世變」與人生欲望的關係，「『世變』把他帶進了世紀末的圈子，有時痛快，有時荒唐，有時昏天黑地，有時清清楚楚，他也曾幾次浮出水面，跳上岸來，一個浪頭，又把他捲了下去。」◎作者特別揭示了香港這個燈紅酒綠的商業社會對於人性的腐蝕，「也曾混起一筆錢，那知有錢便作怪，到了黃昏，心不由主，把那些撈得的

辛苦錢，流轉於曼歌淺笑之中。香港的春天，也真長久得很。」◎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環境，很容易淹滅人的靈魂，讓人的良知處在尖銳的衝突之中。曹聚仁的《酒店》，在路數上大致有點類似同時代的劉以鬯，即不涉及具體的政治，而着力於從人文的角度探討人的內在衝突。只不過劉以鬯較為集中於探討香港這個金錢社會對於人的影響，而曹聚仁的《酒店》題材更為闊大，將動盪的時代、政治及香港社會一併置於自己的視野之中。曹聚仁寫作《酒店》時反覆援引的精神資源是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易卜生 (Henrik Ibsen)、魯迅，他心目中的樣板是曹禺的《日出》。他似乎希望提高到時代與人類悲劇命運的角度，來書寫香港的難民文學。

二次大戰以後，多數殖民地國家獲得了獨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喪失了軍事、政治統治後，卻繼續以經濟、文化的方式對於它們實施殖民控制，圍剿社會主義政權，這被稱為「新殖民主義」(New Colonialism)。關於新殖民主義，較早的著作是1965年出版的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 的《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一書。這本書側重於經濟角度的分析批判，同時也揭示了以美國新聞出版署在非洲冷戰情報和宣傳工作中的運作情況。最近的一本書，是1999年出版的桑德絲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的《文化冷戰：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其文學藝術的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這本書詳細披露了在1947至1967年間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文學藝術的操控情況，包括出資創辦刊物，資助作家等等。由此我們得以知道，很多知名的右派

1999年出版的桑德絲的《文化冷戰：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其文學藝術的世界》一書，披露了在1947至1967年間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文學藝術的操控情況。很多知名的右派傾向的文學作品，原來是美元扶植的產物。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承受英國殖民統治，又承受着美國的文化控制，這在新殖民主義的歷史上是頗值得注意的。

傾向的文學作品，原來是美元扶植的產物^⑥。這一事實，打破人們心目中的文學藝術的自主性的幻想。遺憾的是，可能因為資料的原因，這部書同樣未涉及到亞洲。本文所涉及的美國新聞處及亞洲基金會所操縱的香港綠背文化，可以算得上對於這部書的一個亞洲方面的補充。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它當時尚未獨立，仍是英國的殖民地，卻由其盟友美國進行文化冷戰工作。也就是說，香港既承受英國的殖民統治，同時又承受着美國的文化控制，這在新殖民主義的歷史上是頗值得注意的。

註釋

①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Inc. 1993), 446.

② Julian F. Harrington to Dept. of State, Hong Kong, 9 June 1953, #2526, Subject: Draft Country Plan for USIS Hong Kong, 511. 46G/6-953, RG59, USNA. Johannes R. Lombardo, "A Mission of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The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1949-64",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ed. Richard J. Aldrich, Gary D. Rawnsley, and Ming-Yeh T. Rawnsley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③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檔》(縮微膠卷)增補第5部分，第2卷，第0233-0259號；增補第4部分，第3卷，第00198-00217號(美國大學出版公司，1987)。參見于群、程舒偉：〈美國的香港政策(1942-1960)〉，《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63-65。

④ 趙滋蕃：〈港九文藝戰鬥十五年〉，載《文學原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頁603-604。

⑤ 亞洲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作品其實也並非全部都是反共文學，如沙千夢的《長巷》、《有情世界》，它們是否也是如很多香港文學史所列入的「綠背文學」呢？

⑥ 劉以鬯：〈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在第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上的發言〉，載《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126。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頁35-36；40；17；26；150；218。

⑲ 盧昭靈：〈五十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文藝新潮》的意義和價值〉，《香港文學》，1989年第1期，頁9。

㉑ 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5年第4期，頁102。

㉒ 陳子善編：《私語張愛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㉓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載于青編：《尋找張愛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5)，頁305-306。

㉔⑳㉕㉖ 趙滋蕃：《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頁21；153；21；267。

㉗ 林適存：《鴛鴦》(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

㉘ 傑克：《隔溪香霧》(香港：友聯出版社，1956)，頁255。

㉙ 傑克：《山樓夢雨》(香港：亞洲出版社，1959)。

㉚ 唐人：《阮朗中篇小說選·後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㉛㉜㉝㉞ 曹聚仁：《酒店》(新加坡：創墾出版社，1954)，頁78；154；231；151。

㉟ 洛風：《人渣》(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1955)。

㊱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趙稀方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發表《小說香港》等著作和多篇文學評論。